



1401432

# 勵耘學刊

(文学卷)

2010年第2辑  
(总第12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淮阴师院图书馆 1401432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励耘学刊·第12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077-3735-6

I. ①励… II. ①北…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丛刊 ②汉语—  
语言学—丛刊 IV. ①I206-55 ②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8753 号

出版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刷厂: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 787×1092 1/16

印 张: 35 (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

字 数: 580千字 (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06.00元 (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本)

## 《励耘学刊》（文学卷）编委会

顾 问 童庆炳

主 编 郭英德

副主编 李春青 李 山 杨联芬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宁 乐黛云 刘 利 刘晓南

孙银新 李 山 李宇明 李运富

李国英 李春青 李 强 杨 义

杨联芬 吴福祥 张 健 张涌泉

陈思和 项 楚 郭英德 曹卫东

盛 宁 蒋原伦 蒋冀骋 温儒敏

冯胜利 (美国) 大西克也 (日本)

竺家宁 (中国台湾) 黄坤尧 (中国香港)

李欧梵 (中国香港)

编 务 许庆江

# 目 录

## 新视域

- 新史料全方位的开掘与现代文学史体系的完善..... 范伯群 (1)
- 巫歌、祝由、筮辞：早期语言观念的一个考察..... 沈立岩 (19)
- 古代散文文体研究的两个问题..... 张峰屹 (32)

## 文学史

山岳·文体·隐逸

——《游天台山赋》与《北山移文》山岳书写及其文化

意蕴之对读..... 许东海 (48)

六朝文体论

——笔之文体..... 王令樾 (72)

唐以前的七言诗..... 黎昔非 (90)

《唐以前的七言诗》读后..... 李 山 (105)

“菜园”体验与五四时期文学“志业”观念的发生

——叶圣陶的小说《苦菜》及其他..... 姜 涛 (108)

边缘的丰饶

——澳门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与特殊品格..... 张堂铸 (127)

“意义”的追寻

——阎连科创作心理探析..... 熊修雨 (149)

## 文化研究

浅论刘勰文体分类学的思想渊源与论述体例…………… [韩] 诸海星 (161)

发生着的历史与演进中的形象

——对辛亥从军女性吴淑卿的历史与文学考察…………… 黄湘金 (177)

## 文献考辨

殷璠编撰《荆杨挺秀集》之考辨…………… 轩新丽 (194)

《永乐大典》所收张九龄佚文考…………… 李小龙 (207)

## 青年园地

说书体制对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从石派书到《三侠五义》狸猫换太子故事

形成与发展…………… [韩] 朴炫坤 (215)

欧阳修的思颖诗与致仕…………… 许庆江 (229)

## 文史名家

著名导演、艺术家焦菊隐…………… 田聪英 (243)

## 书评

再求新声于异邦

——读任洪渊《汉语红移》兼谈新视野中的

现代汉语问题…………… 严 靖 (249)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原创品格、中国话语

——评《王泉根论儿童文学》…………… 赵 萍 (257)

在“祛魅”与“返魅”之间

——评《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 魏 英 (265)

# 新史料全方位的开掘与现代文学史体系的完善

◇ 范伯群<sup>①</sup>

**摘要：**国家社科“六五”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是一项宏大的资料工程，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它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对中国文学的古今转换点的资料缺乏足够的重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共生”的大量史料也没有进行充分挖掘。时至今日，甚至连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上限和这门学科应包括哪些内容还在进行争论与探讨。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文章通过几个个案的介绍与剖析，提出应该破除原有的“一元独生”的现代文学史格局，在“凭原始资料说话”的原则指导下，全方位地挖掘新史料，从溯源文学的古今转型来确定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界碑，并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元共生”之原貌，以完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科学体系。

**关键词：**起始探源；一元独生；多元共生；全方位；新史料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牵头下，制订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计划。当这个计划被批准为“‘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后，国内60多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400位专业人员投入了这项规模宏大的工程，从1982年起，这一汇编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简称甲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简称乙种）和《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简称丙种）共计划出版200余种。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第一套大型的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当时独立编著了一本《冰心研究资料》

---

<sup>①</sup> 范伯群（1931—），男，浙江湖州人，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

(2009年4月再版)和参编了《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下)》。至今还怀念当年与全国同行们一起,既无浮躁情绪,在图书馆里坐得定,广泛搜觅;又能走南闯北,纵横东西,不畏旅途劳顿,以一种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精神上下求索的美好时光。以后还有大型的《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等的推出。这次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庞大工程中是否还有不足之处呢,我想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当时,我们没有将中国文学从古典型转轨为现代型的“临界时段”的史料也重点置于我们的搜索视野之中;我们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从晚清民初的量变到1917—1919年的质变的过程这一重大的课题给忽略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组合被分割成近、现、当三个学会,而当时也没有统一的机制去统筹这三段的资料工作的相互的衔接,于是难免各自为政。再加上主观认识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我们所要建构的是“一元独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因此除了搜罗新文学的史料、特别是新文学主流社团和作家作品的史料之外,其他涉猎面并不深广。由于上述的主客观的因素,使我们对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起点”究竟在哪里,到现在还有所争论和正在进行探讨。最近,黄修己教授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一门1949年特定政治背景下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学科,被认为‘思想最活跃’的学科,到现在连时间的上下限还没有搞清楚,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也定不下来,还要争论;所以我觉得现在要产生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是很难的。”<sup>[1]</sup>我以为当今的学术论争是必要的,否则只是“止水一潭”。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我们过去的成绩;同时也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资料工作中作第二度的进军。我们应该去发掘中国文学转型期的现代化萌发的历程,我们应该使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反映清末民初文坛的“众声喧哗”的史实,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是一部“多元共生”的文学史。“史识”来自“史实”。我们应该从挖掘新史料的过程中,“凭原始资料说话”,去重写我们的现代文学史。我们要从新资料中酝酿出新论点来,从原始资料的海平面上浮现出经得起推敲与检验的观点来,而不是用一种先验的观点来局限我们挖掘新资料的工程。

在2010年4月下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的“‘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严家炎教授第一位作大会发言,题名是《“五四”文学思潮探源》,他开宗明义地说:

中国的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这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

像过去那样，现代文学就从“五四”文学革命写起，如今的学者恐怕已很少有人赞成。较多的学者大概都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文学史，应该从戊戌变法也就是19世纪末年写起。但实际上，这些年陆续发现的一些史料证明，现代文学的源头，似乎还应该从戊戌变法向前推进10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起。

根据何在？我想在这里提出三个方面的史实来进行讨论。<sup>①</sup>

严先生的论证是建筑在“凭原始资料说话”之上的。我在这里无法对他的文章作长篇的引述，只能摘要介绍其大意，并简示严先生的结论性意见：“根据近年发现的一些史料，在这个源头上，存在着三座标志性的界碑，一是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文学条下用‘外史氏’名义所作的一段重要评论，它提出了‘言文合一’的理论主张，倡导以口头语为基础来形成书面语，为白话文学开辟了较为宽广的途径。二是陈季同通过法文著作和中文材料，提出了小说、戏剧亦中国文学之正宗，世界文学乃中国文学之参照，倡导大规模的双向翻译等见解主张，打破了千年来某些根深蒂固的陈腐保守、妄自尊大的观念，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三是两部有现代意义的长篇小说：陈季同1890年出版的法文《黄衫客传奇》和韩邦庆1892年发表的《海上花列传》，前者在欧洲较有影响，后者80多年前就已得到鲁迅、刘半农、胡适等多位‘五四’先驱者的高度评价，近年沪地几位学者更对其标志性意义作了相当深入的阐述。三座界碑从理论主张、相互交流、创作成就三个不同方位合力构筑了立体多维的文学新天地，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sup>②</sup>严先生认为，胡适只读过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的诗，却没有发现《日本国志》中的那段文字，因此，他才有这样的“自许”：“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sup>[2] (P17)</sup> 其实黄遵宪恰恰就在胡适、陈独秀之前30年，早早预言了口语若成为书面语就会让“农工商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大好局面。

① 严家炎：《“五四”文学思潮探源》，《“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首篇（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同上。

再说这两部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是中国人用法文写成的，现在正在翻译中。《海上花列传》则是在近年来很引起同行们关注的作品。严先生对这两部长篇作了简介：“如果说《黄衫客传奇》借助成功的心理刻画、细致的风物描绘与神秘的梦幻氛围，构织了一出感人的浪漫主义爱情悲剧，那么《海上花列传》则以逼真鲜明的都市人物、‘穿插藏闪’的多头叙事与灵动传神的吴语对白，突现了‘平淡而自然’（鲁迅语）的写实主义特色。它们各自显示了现代意义上的成就，同属晚清小说中的上乘之作。”<sup>①</sup>

严家炎先生的“《海上花列传》的意义确实属于现代”<sup>②</sup>的见解与我在《〈海上花列传〉：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sup>③</sup>一文中的意见是一致的。如果这个结论经过同行们的鉴定而肯定其科学性。那么正如严先生的“探源”，现代文学的起点就要“向前位移”1/4个世纪以上。再就《海上花列传》是一部艺术上乘的通俗小说而言，那么现代文学史绝不是新文学“一元独生”的历史，而应该是一部“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二

要全方位地挖掘新资料，写出一部“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并非易事，因此，我除撰写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之外，先找几个现代文学史中论争的关节点，尝试去接触有关的原始资料。当我对这些原始资料作了一番搜索之后，在我脑子里所形成的观点与现在的若干文学史上的结论是有很大距离的。这些差距实际上是“一元独生”文学史必然会派生出来的局限，它既不能全面反映我们现代文学的全貌，又有意无意地贬低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和作品。

新文学步上文坛的第一“战役”是批判黑幕小说。有关这一“战役”在文学史上也语亦不详，只留下周作人的两篇名文，即《论黑幕》

① 严家炎在《“五四”文学思潮探源》的“附记”中注明，对《黄衫客传奇》的简介的来源是出自李华川博士的《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等有关著作。

② 严家炎：《“五四”文学思潮探源》。

③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以后有多次转载并已译成英文向国外推荐。

与《再论黑幕》。陈鸣树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中曾提及，1916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开辟‘上海黑幕’专栏，自此黑幕小说开始风行”。<sup>[3] (P427)</sup>我专程到上海图书馆里查阅了1916年9月1日至1918年11月7日的长达25个月的《时事新报》。1916年9月1日是《时事新报》发起“黑幕大悬赏”的第1次征文启事，这个征文启事在《时事新报》上一共刊登了18次，说明该报对这次征文的重视程度。在启事中说：“上海五方杂处，魑魅魍魉群集一隅……名为繁盛之首区，而实则罪恶之渊藪，魔鬼之窟穴而已。”因此该报“特备奖金，广征答案”，目的是“共除人道蠹贼，务使若辈无逃形影，重光天日而后已”。这是一篇很具“讨伐性”的启事。它声明要讨伐的对象是：探警、游民、苦力、娼妓、拆白党、洋奴、烟界、赌徒、拐骗、匪徒等等“黑幕”。对政坛、官场、商界等倒并不予以关注，而“洋奴”一项内又注明是指“西崽”，却不列入“买办”之类。可见这次“广征答案”是既有所回避，格调又不高。但这一专栏起初还是广泛受到市民的欢迎的。对市民而言，可以增强其“自卫性”，同时这个专栏又熔消闲、趣味与知识性于一炉，因此从1916年10月10日开栏至1918年11月7日撤栏，这个专栏在《时事新报》上是一天不漏地占有一定的篇幅。这一专栏使该报发行量大增，而且每半个月，又将这15天的黑幕栏的内容用4整版的篇幅再重新刊登一次，以招揽读者与订户。这种用专版重登的方式发行了7次之后，该报又在1917年3月16日宣布，由于篇幅扩张，单张无法容纳，又不便“携带传观”，现“本报第8次再版单张改装书本”。其实这就是“‘黑幕’书”的起始。该报的长期订户都能得到这种“黑幕书”的赠送，以致成了该报商业炒作的一种经营策略。可是在貌似“热度”一路攀升中，专栏稿件的内容却每况愈下，在揭露丑类时描绘犯罪细节，乃至渲染情色，刺激读者感官。这种“黑幕书”编印了12册之后，正值1917年10月10日，是开栏一周年纪念，于是该报又出版了《〈时事新报〉上海黑幕一年汇编》，这是第3次重复刊登这些黑幕的内容，篇幅达800多页。以后约过了半年，到1918年3月18日，该报又刊出“本馆上海黑幕汇编第二编出版预告”。由于《时事新报》的倡导，社会上“黑幕书”也盛行一时。在1918年3—5月的《申报》广告栏中，就有《女子黑幕大观》、《全中国娼妓之黑幕》、《小姐妹秘密史》（又名《女子三十六股党之黑幕》）、《上海秘幕》、《绘图中国黑幕大观》等等，简直成了“人渣大展览”，社会效果极为恶劣。在1918年9月15日有《教育部通俗研

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的发表。社会上有识之士的舆论对《时事新报》也极为不利。1918年11月7日《时事新报》只好发布通告：《本报裁撤黑幕栏通告》：“黑幕者，本报本其改良社会之宏愿，特创之一种纪实文字也。”自认主观意图是好的，可是这种良好的主观意图被各小书肆所利用了，“试就各报广告栏，而一计之下，不下百十种之多”，《时事新报》并不检讨自己发表的文章日趋煽情低下，只承担“本报以自我作俑，引咎自责。……爰特将本报黑幕一栏，即日取消。……至于定报赠品，仍赠黑幕乙编全部。特此通告。”至于周作人的《论黑幕》与《再论黑幕》，还有钱玄同的《“黑幕”书》、志希（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都是撤栏以后清扫战场的文章。当然是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作用的。

但是这些批判文章有一个严重的“错位”，那就是《时事新报》的黑幕栏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它只是出了题目“广征答案”，这是一种与小说毫不相关的“纪实文字”。可是从教育部的“劝告”到周作人的文章，都将“黑幕书”与“黑幕小说”混为一谈。这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从此，“黑幕小说”在中国就成了“众矢之的”。

在全球语境中，文学界皆认为，凡是具有“曝光”性质的小说、揭露黑暗面的小说就称为“黑幕小说”或“揭黑小说”，黑幕小说的内容当然有高尚严肃与低下煽情之分，但黑幕小说这个名词应该不帶有任何贬义。这种小说自古而然，并非因《时事新报》开设黑幕栏而“自此黑幕小说开始风行”。在美国甚至将《汤姆叔叔的小屋》（林纾译为《黑奴吁天录》）也划归于这一类型之中，杰克·伦敦认为这些小说“揭露了我们国家的真实情况，压迫与不公正的渊藪、痛苦的深渊、苦难的地狱、人间魔窟、充满野兽的丛林。……《汤姆叔叔的小屋》描述的是黑奴，那么《屠场》很大程度上是揭发今天的白奴制”。<sup>①</sup>在20世纪初至“一战”前的美国，一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也包括一些大学教授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展开了一场长达10年左右的“揭黑运动”，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黑幕小说”、“揭黑报告文学”或“揭黑的新闻深度报导”。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这些小说或新闻初兴时颇有反感，称这些作者为“耙粪者”——眼睛死死地盯着地上的那些污秽，不停地耙着。可是经人的说服

---

<sup>①</sup> 转引自肖华锋《〈屠场〉与美国纯净食品运动》，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与实践证明，他觉得可以利用这股揭黑文字的力量“制造公众舆论”，为美国的进步与改革开路，从而也使自己得到“很能顺从民意”的好口碑。这实际上是扩大了他的总统的权力，使美国当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校正，也为他赢得连任的选票。周作人虽然精通多种外文，可是从他的文章似乎对美国长达10年的揭黑运动是并非知情的。

《时事新报》“征答”的格调本来就不高，加上日趋煽情低下，这当然是错误的。而周作人等不分青红皂白，在“黑幕书”与“黑幕小说”之间画上了等号，一概加以否定，影响所及，日后在中国“谈黑色变”愈演愈烈。可是在民间却有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用媒体对社会的黑暗面进行“曝光”是有一定的震慑力的，不过现在冠以反贪反腐小说之类的名义罢了。

通过上述的原始资料的挖掘与鉴别，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第一战役就存在“双错现象”。或许这种“双错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并非是个别的存在。这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探究。

### 三

我找的另一个关节点是新文学与市民文学“分道扬镳”的历史过程，我的文章的题目是《1921—1923：中国雅俗文坛的分道扬镳与各得其所》，2008年6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共生新体系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一个初稿。今年4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在这一初稿中添加了许多新资料，并作了重大的修改。

在1921年之前，新文学作家与市民通俗作家还有许多合作的经历。部分通俗作家也表现出有“趋新”的倾向。表现之一是，当时茅盾主持《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周瘦鹃就是这一“小说新潮”栏的台柱。在1920年的12期“小说新潮”栏中，周瘦鹃的名字出现了15次之多。表现之二是通俗作家胡寄尘也在新潮栏中发表新诗。胡寄尘的新诗集《大江集》是继胡适的《尝试集》后的中国第二本新诗集，比郭沫若的《女神》早出版5个月。《大江集》的第一首诗是《长江黄河》：“长江长，黄河黄，/滔滔汨汨，浩浩荡荡。/来自昆仑山，流入太平洋，/灌溉十余省，物产何丰穰，/沉浸四千载，文化吐光芒。/长江长，黄河黄，/我

祖国，我故乡。”胡寄尘自我介绍说：“它的好处在于对偶和押韵的地方，完全是天生成的，没一字是人工做成的。”<sup>[4] (P112)</sup> 在我们今天看来，倒是很有点爱国情愫的。这首诗被胡寄尘视为是他的新派诗的“典范”，其实他是想写成一种可哼、可吟、可唱的，具有民族形式的新乐府式的白话诗，这未始不是一种新尝试、新探索。在茅盾主持的新潮栏中，胡寄尘发表了一首当时很有点名气的新诗《燕子》，有人说他的《燕子》比胡适的《蝴蝶》写得好。可是在我们的文学史中是找不到这本有一定的探索精神的诗集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排挤现象。表现之三是通俗作家在1921年1月出版了一本《新声》月刊，其中的“思潮”栏有些杂文对“五四”新潮予以高度的赞扬。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在第1期中严慎予的《新思想发生的源泉——“思惟”》一文的开端就写道：

“五四”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突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切旧制度旧习惯，统统有“立不定”、“站不住”的趋势，破产的时期也快到了。可是旧制度、旧习惯的本身，并没有变化；是因为“人”对于这种制度、习惯，仔细观察，觉得非常怀疑，非常惊骇，于是现出一种不安的状态，有了脱离这些制度、习惯的要求。这一点“怀疑”，便是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破产；新制度、新习惯、新思想建立的发源和根据。

文章热情地歌颂“五四”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另一位作者沈玄庐（他曾是1919年6月8日创办的进步刊物《星期评论》的主编之一），则写了一篇杂文《解放》：

现住的世界，是什么世界？是已经觉悟的世界。觉悟点什么？觉悟“解放”的要求。觉悟了，能够不解放么？

家属要求家长解放，女子要求男子解放，工人要求资本家解放，农夫要求地主解放。那班做家长、男子、资本家、地主，解放不解放，诚然有一种肯与不肯的问题；但是家属、女子、工人、农夫，是要求定了。

可是这本想步《小说月报》的半革新后尘的刊物刚出版不到一个月，《小说月报》就全面革新了。像周瘦鹃这类被视为“旧文人”的作家

也不可能再在《小说月报》露面了。但是周瘦鹃等还在自己所编的《申报·自由谈》中表示自己的“趋新”愿望。他每逢星期日刊出一期“星期小说特刊”，除了每期介绍一位优秀的外国作家之外，经他手所发的稿件中还有许多盛赞新文学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对鲁迅的小说推崇备至。例如作者凤兮在《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上）》中写道：“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一篇，描写中国礼教好行其吃人之德，发千载之覆，……置之世界诸大小说家中，当无异议。在我国则唯一无二矣。”（1921年2月7日刊）。而凤兮所写的《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下）》中又提及《狂人日记》：“文化运动之轩然大波，新体之新小说群起，经吾所读自以为不少，而泥吾记忆者，止《狂人日记》，最为难忘。”（1921年3月6日刊）而凤兮的另一篇《海上小说家漫评》中还这样评价刘半农：“不五年间，脱离卖小说生活，而列于新学者之林矣，不亦可敬哉。”（1921年1月23日刊）这其实就是对刘半农的“跳出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其他对胡适、周作人和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都予以好评。

可是新文学家并不理会周瘦鹃等人的趋新的表现，当时，年轻的新文学家身怀抱负、充满激情、叱咤风云，也自视甚高。文学研究会会有雄心打破“旧文艺”垄断的文坛，但它正在打破这种垄断时，创造社却又发文说：“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渐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sup>[5]</sup>文学研究会也成了创造社要“打破”的偶像。这种斗争的姿态在文学转型期的“先锋文学”阵营里是常见的现象。1921年5月，茅盾与郑振铎创刊《文学旬刊》，茅盾在1979年所写的回忆录上回顾道：“《文学旬刊》创刊时曾公开说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我们在它上面发表文章就不必存什么顾忌了。首先，我们对于鸳鸯蝴蝶派就可以正面攻击。”<sup>[6]</sup>于是有“趋新”表现的周瘦鹃等人就成了他们主要的批判对象。

我们应该肯定，《文学旬刊》上发表了不少好文章。有的批评也是正确的。但在《文学旬刊》对鸳鸯蝴蝶派的一些批判中，有时缺乏以理服人的态度，对他们有“趋新”和“靠拢”的表现也缺乏一分为二的态度，采取的是以“痛斥”为主要手段的“严拒”。该刊的“记者”在回答读者来信时说：

《礼拜六》那一类东西诚然是极幼稚——亦唯幼稚的人喜欢罢了——但我们所不殚劳的再三去指斥，实是因为他们这东

西，根本要不得。中国近年来的小说，一言以蔽之只有一派，这就是“黑幕派”，而《礼拜六》就是黑幕派的结晶体，黑幕派小说只以淫俗不堪的文字刺激起读者的色欲，没有结构，没有理想，在文学上根本没有立脚点，不比古典派旧浪漫派等等尚有其历史上的价值，他的路子是差得莫明其妙的；对于这一类东西，惟有痛骂一法。<sup>[7]</sup>

此文将“先锋文学”之外的常态文学“一锅脑儿”都归入“黑幕派”门下，这本来就已很成问题了。而对待此类东西，“惟有痛骂一法”，更令人感到只有简单地“扣帽子”，而缺乏理性的分析。因此在文章中经常出现“文丐”、“文娼”、“狗只会作狗吠”等诬蔑性的词语，认为通俗文坛已“无可救药”。而对周瘦鹃的表示要关心“社会问题”与“家庭问题”的回音，则是斥为：“什么‘家庭问题’咧，‘离婚问题’咧，‘社会问题’咧，等等名词，也居然冠之于他们那些灰色‘小说匠’的制品上了。他们以为只要篇中讲到几个工人，就是劳动问题的小说了！这真不成话！”<sup>[8]</sup>究竟不成什么话呢？语亦不详。无论是点名的或不指名的批评，周瘦鹃则也有一贯的宗旨，他说：“在下是个无用人，一向抱着宁人骂我我不骂人的宗旨。所以无论是谁用笔墨来骂我，挖苦我，我从来不答辩。”<sup>[9]</sup>因此双方的论争常常是有来无回的。

我觉得这至少是某些新文学倡导者的一种焦躁情绪的反映。他们对通俗文学在市民阶层中的流行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样“低劣”的刊物会如此畅销；而相形之下，新文学却只能在知识阶层中找到自己的读者。因此，在“痛骂”通俗作家之外，就只能去怪责读者不争气，即迁怒于读者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读者们不仅仅是幼稚的问题，“说一句老实话罢，中国的读者社会，还够不上改造的资格呢！”<sup>[10]</sup>它是个“懒疲的‘读者社会’”。<sup>[11]</sup>“现在最糟的，就是一般读者，都没有嗅出面包与米饭的香气，而视粪尿为‘天下的至味’。”<sup>[12]</sup>总之，在《文学旬刊》的某些编、作者看来，“一般口味低劣的群众正要求着腐烂的腥膻的东西”，是“不生眼睛的‘猪头三’”。<sup>[8]</sup>

直到1923年7月《文学旬刊》改版为《文学》周刊，发表宣言：“认清了我们的‘敌’和‘友’”，这说明“分道扬镳”已绝无挽回的可能了：

以文艺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蔑文

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的文艺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为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sup>[13]</sup>

鲁迅曾明确说过：“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sup>[14] (P112)</sup> 这是很实在的话。但古国的一般人总要有自己看得懂的文艺。茅盾在1928年也承认：“六七年来，‘新文艺’运动虽然产生了若干作品，然而并未走进群众里去，还只是青年学生的读物；因为‘新文艺’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地盘，所以六七年来不能长成为推动社会的势力。”<sup>[15] (P378)</sup> 新文学作品当然有它的长处，不仅探求人生，优秀的小说还研究“国计”——例如茅盾的《子夜》研究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要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等等之类的问题；可是老百姓还没有达到研究“国计”的高度，他们关心的是“民生”——直白地说：就是“我们要吃饭”。在新文学家中间好像朱自清最懂得这个道理。他认为古人从实际政治中懂得了“民以食为天”的道理，直到现在，我们的老百姓也还只认那“吃饭第一”的理儿。朱自清认为，相对老百姓而言，知识分子有时还不太认识到“吃饭问题”的严峻性，或者他们愿意为自己的理想去忍受暂时的饥饿，“不像小民往往一辈子为了吃饭而挣扎着”。<sup>[16] (P155)</sup> 想当年，天灾人祸将许多难民灾民或其他想找饭吃的人驱进了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通俗作家就是应老百姓之需，告诉他们在这个五光十色、千奇百怪的冒险家的乐园里，老老实实的乡民们要随时警惕暗处潜藏着的陷阱与捕机，千万不能再上“路边炸弹”，以致被炸得“五花粉碎”。再进一层，就是关心乡民进城以后如何从乡民转型，融入市民社会的问题了（这里也包括久居上海的“中国老儿女们”，他们也急需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得到转型的新信息）。“乡民市民化”也是一项现代化的工程，也需要“启蒙”。从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到如何角色转型，这对老百姓说来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应该说，帮助乡民懂得此类问题也是一种人文关怀。因此，分道扬镳也并非坏事，在各得其所中，通俗文学就主要承担了“乡民市民化”的重任。也许在当今的所谓“乡下人进城”的热潮中，随着“城市病”的加剧，我们更加会体会到“乡民转化为市民”的工程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由此反观，也会联想到当年面向知识精英的新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的确